

（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动乱年代】	中国科学院文化大革命运动述略（上）	杜钧福
【追根溯源】	关于文革的基础条件	李大同
【血雨腥风】	重庆文革武斗往事	王昊轩
【史海钩沉】	考教授：“文革”荒诞事	刘振修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动乱年代】

中国科学院文化大革命运动述略（上）

• 杜钧福 •

〔作者按：1964年我从北大毕业，到中国科学院当研究生，并在这里参加了文革全过程。但我不是领头人物，也缺乏充分资料，所以对中国科学院（以后或按当时叫法简称科学院）的文革进程只有个大致了解，今简述之。〕

中国科学院是1949年建国后按照苏联科学院的模式，在接受民国时期一些研究机构基础上，作为国家最高科学研究机构建立起来的，1955年院内建立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地学、技术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四个学部。郭沫若为院长，文革开始时张劲夫为党委书记、副院长。科学院还收留了不少犯了错误的高级干部在此担任领导，如前山西省长裴丽生、前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杜润生、前吉林省委副书记李德仲，都是院党委委员。而高岗的“东北局五虎”之一的张明远，则担任我院北郊办公室主任。李德仲第一次来院与群众见面，自我介绍说他是“坐降落伞下来的”。这些干部大多是知识分子出身，又遭遇过挫折，自然不可能太左，所以我院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经历尚比较平稳，在反右运动中打的右派分子也不很多，高校打的右派分配到我们这里也还过得去。之所以能够如此，也因为这样的单位不为中央重视，看作犯错误干部的处理场所，认为不像高校，能折腾出什么花样来。

中央把科学院当作可有可无的部门，因为科学事业，特别是自然科学，在执政党的话语系统里还一时找不到适当的位置。在党的领导关系中，一直把科学院放在宣传口。因为有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在，这样放也有道理。但是，科学院在两弹一星事业中实际贡献甚巨。特别是人造卫星，在开始时期是以科学院为主的。为发展尖端科学，科学院于1960年成立了新技术局，以胡乔木夫人谷羽为局长，领导一些基础科学和新技术的所。其余的所归计划局领导。可能通过胡乔木，新技术局和国防工办挂上了钩，在器材供应上列为04单位。这个04单位的介绍信，在一些小地方管用，在上海那种地方就没人理。那时候没钱，有钱也买不到东西。连普通的电子管也分三级：军用、专用和民用。一般科研单位只供应专用。

科学院建立之初，北京的研究所分散各处。1958年以后，几个主要所搬迁到中关村，后来又在北郊建设了几个所，但重心仍在中关村，与北大清华为邻。当然哲学社会科学部仍留城内。我们一些单身职工当时住在中关村88楼（原址在现四环路中关村三桥西南角），1966年7月25日晚间听北边人声鼎沸，半边天都被灯光照亮，原来是北大东操场开大会，江青等领导人都来了。1968年3月29日夜北大开始武斗，入夜之后嘈杂之声也传到我们这里。那时候城市污染不严重，光和声波都能传很远。这样的环境使得我院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闹得轰轰烈烈。我们单位有两职工，家属在房山的原子能所二部就是今天的原子能科学研究所工作。就因为他们常回中关村家里得风气之先，在本单位造反走在前头，被打为反革命，占该单位“三家村”之二。

◇ 应地所事件

科学院文革初期的主要事件是应地所事件和化冶所事件。应地所是应用地球物理所的简称，是现在空间中心的前身，当时位于西苑。关于应地所事件详情，可见拙文《文革初期的应地所事件》。现简述之。

因为文革开始时院保卫部对各所所有人员“政治排队”的布置被泄漏，也因为该所保卫处长董如江因思维障碍说一些涉及政治的胡话，以政治部宣传干事、转业军人王锡鹏为首的一些青年人在文革初期紧张气氛下，怀疑院里有人参与政治阴谋，于是将董“保护”起来，以免被灭口，称为董如江事件。

又因院布置在6月20日以后全体人员下乡参加麦收，王锡鹏等人怀疑也是个阴谋，因为此时麦收季节已过。他们于19日乘卡车到中关村向群众宣传抵制此事。此时，院领导已将他们内定为反革命。

6月22日，聂荣臻和陈伯达先后来到中国科学院，主要讨论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起草的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保护自然科学家的政策性文件，也肯定谈到应地所事件。陈伯达对张劲夫说：“你要把权夺回来，不然一切后果你要负责”。（吴明瑜等《汪志华》，中国科学院网站）

这个保护科学家的条例未完成，但是院领导确实有保护科学家的意愿，在遇到猛烈的群众运动冲击时，没有像一些高校那样，抛出几个著名科学家当靶子以保护自己。从这一点来说，以张劲夫为首的院党委确实是一个值得尊敬的集体。

因当时周恩来出国访问，6月23日院领导向“国务院负责同志”李富春、聂荣臻两位副总理汇报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聂力：《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两位副总理对此作出了指示。院领导据此制定了“反击”方案。

他们按照北大的模式，安排了应地所一位行政干部吴智诚在23日晚上贴出一张揭发王锡鹏等人罪行的大字报，翌日出版了一期《科学报号外》，登载了这张大字报，还发了题为《应地所反革命复辟》的报道和一篇社论，号召全院职工反击这些反革命分子的反党活动。《号外》共点了六个人的名字。他们是赵子善、王锡鹏、章公亮、范天锡、田淑清、吴蓉璋。后四人是研究室里的研究人员。赵子善是前办公室主任，并没有参加王锡鹏等人的活动，加上他一个算当权派。24日，王锡鹏等人在地球物理所门口被斗争，然后被监禁起来。这种非法监禁有一个中性的名称：行政看管。同时派工作组进驻应地所，接管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权。

6月25日，又在中关村召开声讨大会，声讨化学冶金所的反革命事件。这个事件远不如应地所影响大，但是其领导人物李亚男家庭出身不好，有典型性，所以在全院范围内予以声讨。

6月27日左右，下去麦收劳动的院里其它所的人员陆续回所，发现形势大变，大字报铺天盖地，已不再针对领导，而是反击前一阶段给领导提意见的普通群众了。周末不休息开会，发下《科学报号外》学习，讨论应地、化冶两所是不是反革命事件，麦收是不是大阴谋。在前一阶段给党委贴大字报的人全都遭到批判，大批群众被打为反党分子。

6月28日，陈伯达来到应地所，质问为什么抓人，要求将王锡鹏等放出，用辩论解决问题。他说：“他们的做法不对，你们也不对嘛！人家扣了你们一个人，你们就扣了人家六个人嘛！”（韩钟昆《裴丽生传》，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7月1日，王锡鹏等被放出，但仍被批斗。他们通过不同途径向中央进行了申诉。

◇ 七二零科技界大会

1966年7月初，周恩来外出访问回国，开始涉足文革领导，对运动方向进行调整。7月8日，他指示成立调查小组，复查应地所问题。27日该小组得出结论，仍维持原来定性。（中国科学院（京区）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委员会斗争张劲夫反党集团筹备组《中国科学院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1956—1966》，1967）但从7月中旬以后就实际上停止了对王锡鹏等和其它所的反革命分子的批判，开始正常业务工作。

此时，文革初期的“五十天”已进入退却阶段。和其他系统一样，领导悄悄地扭转运动方向，当时被称为“转弯子”。对于前期被批判的那些人，无论领导和群众都相信他们仍是反革命，只是要等运动后期处理而已。

7月18日，张劲夫作了“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掀起四大新高潮”的动员报告。在报告中仍坚持两所事件定性：“在这期间，应地所、化冶所出现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打着文化革命旗帜，反对文化大革命，浑水摸鱼，篡夺领导权，拦腰一冲。两单位运动无法正常发展下去。革命派被迫斗争，很快夺回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排除了干扰，把运动重新引入正确方向。绝大多数单位，还是继续放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直到现在。”

对于当前运动，他说：“好多同志对14条提出意见，希望进一步提。对72条、研究生制度也提出意见。72条有严重错误，希望大家批判。研究生是全国的制度，须向上级反映。院里暂时停止招生。”

所说14条，是1961年国家科委和科学院提出、经中央批准试行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72条，是科学院1964年制订的《中国科学院工作条例（自然科学部分，草案）》，都是大跃进失败后执行比较务实方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举措，在当时有一定积极意义。因72条是科学院文件，所以张劲夫承认有错误，对于14条，实际也鼓励批判。

张劲夫还宣布，院党委委员杜润生（秘书长）和卫一清停职检查。后来很快对他们进行了批判斗争。

1966年初，院部从城里文津街迁至西郊友谊宾馆北楼。7月中旬以后，院里在这里开辟了大字报园地。所有大字报均不提前期的“反击”，大多针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的。如批判钱三强的“红专矢量论”（说红是矢量的指向，专是矢量的大小）。还有一位什么所里的司机贴大字报说，就是这些研究生最可恨了，应该把他们全都送到越南前线去。

此时已经暗流涌动，特别是7月下旬以来北大局势的迅速发展鼓励了那些开始造反后来又被批判的年轻人相信，自己绝对不是什么反革命。而如果自己不是反革命，造成这一切的领导又是什么呢？

继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市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文革积极分子大会，市委正式宣布撤销工作组之后，7月30日，中央文革在人民大会堂召集科技界大会，主要是科学院、国家科委两系统，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也有人去了。科学院的“反革命分子”王锡鹏、科委的“反革命分子”张本不但出席了会，还讲了话。据说王锡鹏是陈伯达找去的。最后江青、陶铸、康生、陈伯达讲话。江青讲得很简单，说是毛主席叫他们来的。陶铸说王锡鹏同志也可以讲话，王锡鹏没开除党籍，还可称同志，没我们支持他今天来不了，要保护少数。陈伯达讲得最长，说东方无产阶级要超过西方资产阶级。也许因为他挂名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所以说这些问题。

这次大会是科学院文革的转折点。此时人们看出，这次文革绝对不同于以往的政治运动。刚恢复的业务工作又停止了。

◇ 两派形成和斗争

1966年8月初，中关村大操场（现四环路北侧院图书馆处）首先出现电工所的大字报。因为北大和聂元梓一起写大字报的杨克明此时已经调到电工所，这大字报应与其有关。

嗣后，院里在大操场搭了席棚，开辟了大字报园地。此后，中关村大操场便成为科学院文革运动的中心。离得远的单位经常用大汽车拉来他们所的人来此看大字报。因为运动走在前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人也来此活动，支持给应地所事件翻案。他们主要是哲学所、世界宗教所、东南亚所的人。其中哲学所的王树人是北大毕业生，多次在科学院辩论会上发言。

7月31日，在大操场内的灯光球场开辩论会。一方是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人，一方是应地所的人。当时科学院的造反派还刚刚形成，一般还不敢在应地所事件上表态。所以当时科学院的运动是靠外力推动的。除去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人以外，邻近的北大技术物理系的学生也来此活动，曾和科学院的西郊办公室领导发生冲突。北大学生提议8月11日晚上在灯光球场开辩论会。

此时人们的情绪已经极其兴奋激昂。灯光球场装不下，很多人站在外面旁听。会议主席是天文台的艾国祥。他也是北大的毕业生，文革后期不再热心运动，文革后作出成绩被选为科学院院士。

这个会一直开到夜里两点半才结束。最后维护原定性的应地所保守派完全理屈词穷。会议通过致中央电，后来称为万人大会。保守派攻击说根本没有万人。实际上在对立两派中，造反派的劲头比保守派大得多，能坚持到最后，所以赢得胜利。

除去应地所事件渐渐翻案以外，新华社记者张丽君在大操场贴了一张大字报，揭露4月院党委扩大会议的决议说政治要落实在业务上，后来《解放军报》批判了这个提法，《人民日报》在报道这次会议时改口说这次会议批判了这个提法。

风向渐渐在变。除去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人以外，中国科技大学专门组织了一个“革命造反派”介入我院运动。在院内，则是天文台和数学所的造反派成为中坚力量。

在我院文革初期，带头造反的所是那些基础研究的所如数学所、天文台、物理所，和尖端技术的所如自动化所。原因之一是这些所正处于大发展时期，每年有大量批高校毕业生分配进来，形成造反派骨干。有些所甚至一年有百人进所。其二是这些所都处于中关村，得风气之先。地理所、遗传所等所远在北郊。其三，是这些做定量研究的所里的人习惯于思辨性思维，和做定性研究（生物、地学）的人的思维方式有所不同。这一点，和反右斗争中学校物理系的右派多一个道理。

在天文台和数学所，保守派根本形不成队伍。少数所如化学所造反派很孤立，为保守派大本营。多数所为造反保守两派对立。只有电子所比较特殊。该所原是南北两所合并成立的，在文革初期按原来所属的所分成南北两派。

从人员类别说，造反派多是近年来刚毕业的大学生。研究生中造反比例也很大。也有一部份如王锡鹏这样转业军人参加。至于保守派以干部党员居多，领头的有很多复员转业军人。工人发动较晚，但后来多参加造反派。

◇ 大操场辩论会

8月14日，周恩来接见应地所事件当事人中的赵子善、王锡鹏、范天锡、章公亮四人。原排在最后的吴蓉章是中国科技大学1963年毕业生，是这伙“反革命”中最年青的，当局在“反击”中采取分化策略，策动她“反戈一击”。所以直到8月初，她还到处检讨，说自己就是反革命。可能因为这个，周恩来没接见她。至于另一女士田淑清也没被接见，也许是被陪绑了。这一接见是周恩来正式直接介入科学院运动的开始，也大大鼓舞了造反派。

8月18日在大操场开辩论会，因为灯光球场嫌小了。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派来的联络员刘西尧明显偏袒造反派。

8月25日，院内13单位造反派在此联合开大会，声讨院党委，并提出罢张劲夫的官，部分群众还涌到院部“造反”，闹了一晚上。

作为反击，8月30日，全院保守派3千多人在大操场集会，会后结队到各所游行，“宣传十六条”，并就此成立全院的保守派组织“串联队”。在这之后，造反派才成立所、院两级的群众组织。

经一段时间的调研后，周恩来决定开全院的辩论会。会议仍在大操场开。大操场和毗邻的动物所间开一个小门供他出入。第一次会在9月5日晚间举行。首先让张劲夫表态。因为造反派坚决反对他检讨，所以称表态。然后是应地所两派代表发言，分别是王锡鹏和吴智诚。再后面是地球物理所、自动化所的两派代表发言。造反派皆说张劲夫的表态不诚恳，保守派皆说很诚恳。王锡鹏讲得还可以，说明他有一定能力。吴智诚已不被当时群众看好，一上台即引起哄笑。自动化所代表造反派发言的是1965级研究生陈小虹，后来他成为院革委会委员。

9月7日继续开会。只有四人发言：大气所和物理所的两派代表。物理所代表造反派的1965级研究生常龙存，后来他成为物理所革委会主任。他们讲过后，一位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人临时要求讲话，他最后喊了打倒张劲夫的口号。

大会进行期间，周恩来出去接过一个电话，处理到东北串联红卫兵劫苏联火车事。

也许本来还安排了发言，但是周恩来临时决定作了最后讲话。他的讲话要点有这些：1，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对目前情况不满。2，对这个大会不满，实际中止了大会，要求各所分别开会辩论张劲夫的表态。3，说科学院的情况很复杂，要是罢官能解决问题，早罢了。4，对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人不满，要求他们不要再参加这边的运动，也要求科技大学的学生回校参加运动。

造反派对周的讲话感到不满，因为没支持造反派，也因为让科技大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人离开。但是这些造反派也就是腹诽而已，没人敢公开反对。

执行周的指示，把辩论会降了一级，在各所分别开，由各所属单位（研究室等）两派代表分别发言辩论。另调查统计每人对院党委和张劲夫的态度，有多项选择，例如可以打倒张劲夫，也可以建议停职。统计结果未向群众公布。

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造反派回去了，没有再来。他们从此和这边分家，直到文革后成立社会科学院。后来他们那边文革闹得更厉害，和他们分家应是明智之举。科技大学“革命造反派”宣布解散，以后也基本未介入科学院的运动。

各所里开完辩论会后，大家各自保留自己的意见，就没什么事干了，于是恢复业务工作，运动陷入低潮。

但是周恩来继续过问科学院运动。他经常在国务院小礼堂召集院里两派代表开会，并作一些指示，由代表们回来口头传达。他当时对两派持均衡对待的立场，实际有利于造反派。例如他批评院里只给保守派铅印传单，称为铅印传单事件。

他还不止一次提到，一个人家庭出身好是一个好，表现好是另一个好。赫鲁晓夫出身好，表现不好，而他周恩来自己出身不好，但表现好。这话听起来有些问题：难道赫鲁晓夫和周恩来能等量齐观，都是一个好吗？还有一次他谈到历史上的“查三代”，还是持肯定态度的。对这些讲话，造反派都不很满意。但是他也说过，斯大林的党不如列宁的党。列宁的党是生动活泼的。这些话，造反派爱听。

当时对“查三代”等问题敏感，因为当时正处于“红八月”以后。“红八月”中的破四旧在中关村地区影响不大，抄家打人事少于城内。有周围的中学红卫兵来此滋事，实施暴力行为。血统论也影响不大，造反派组织成员的家庭出身比不过保守派，但其中“黑五类”也很少。少数有问题者，迫于血统论压力，叫他们悄悄退出了。科学院也成立了专收“红五类”的红卫兵，倾向造反派，但在整个文革过程中没起什么作用。

◇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966年10月初，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追查整群众的“黑材料”，运动进入新的阶段。

第一件事，是解散了各所的牛鬼蛇神劳改队。这些劳改队多成立于6月，收容了揪出的各类“牛鬼蛇神”分子，但是被批判的造反派一般不在其内，所以在“五十天”被否定后没有立即解散。现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家感到这些人也没什么问题，即使有问题也不是运动重点，所以都给解散了。这些人的问题也没人过问，直到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重提，劳改队再次成立。

第二件事，是造反派整理队伍重振旗鼓。原来的全院造反派队伍称“革命造反宣传团”，为一个松散的联盟，现在改称“革命造反团”，简称“造反团”。各所的组成队伍均称大队，如天文台的东风大队、数学所的火炬大队、物理所的革命造反大队、力学所的红军大队等。各大队由若干战斗组组成。

第三件事是召开各级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议。这些基层的会议，已不是辩论会，也不是批斗会，一般对事不对人。例如在研究室一级，在会上先由支部书记代表支部检讨，然后大家发言批判。在院一级，造反派开大会批判张劲夫，保守派就批判院第二把手裴丽生。到了10月下旬，院党委公开为应地所、化冶所事件平反。

1966年11月5日，造反派到院部抢“黑材料”，张劲夫交出了作为中央文件的两份总理关于应地所事件的讲话。这个讲话，6月24日处理应地所事件时在公开场合念过，所以也不算什么机密文件。11月6日，院“造反团”派人到李富春办公室询问此事，后来得到李富春办公室一信，说所谓中央文件完全是张劲夫一手编制和伪造的。于是“造反团”及下属组织连夜贴出大字报和大标语，要求罢张劲夫的官和改组院党委。11月7日凌晨时分，周恩来联络员找“造反团”开紧急会议，说李富春办公室的信必须收回。联络员还对“造反团”说，张劲夫为什么把这个材料给你们？于是这天下午，“造反团”采取非常行动，到院部把党委一些材料封了。王锡鹏则封了院保卫部长宫震的办公室。

造反派此时明白，两个副总理的指示当然确有其事。看到中央文件的造反派也没有泄露其内容，所以至今人们也不知道具体内容是什么，当然也不难猜。造反派也明白，不管此事真假，周恩来的意思是别把火烧到两位副总理头上，而叫张劲夫承担全部责任。道义上对不对无人考虑。这以后形势就急转直下。抄出的“黑材料”暴露了许多“反击”期间的内幕。在几个所里揭发出在1966年7月，曾执行过一项极其机密、“单线联系”的中央交办“西公”专案。这个专案的内容就是要在1966年国庆前，把一些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员予以处理。这些政治不可靠人员被划分为五类，其中最不可靠的要分别送往山西五台和江西上饶两地。一些所里被打为“反党分子”的人员其实就是这个“西公”的候补名单。在这个名单中有被认为有政治历史的人，也有文革初期反对党委的人。后来很著名的科学家、曾任科技大学校长的管惟炎也被打成二类“反党分子”。由于这些“反党分子”名单涉及人员太多，激起了几乎所有人的愤怒。

还有些“黑材料”是文革初期院保卫部派遣一些特情人员以伪装身份到基层接近造反派群众探听的消息。看到领导以此种对待敌人的手段对付群众，也使群众思想迅速左转。

这时已是12月，借口和李洪山有联系，“造反团”揪斗了保守派“串联队”头头，各保守派组织均被捣毁。中间群众转向，造反派队伍空前扩大。一些“摘帽右派”也参加了造反派组织。文革主导思想被大多数群众接受，造反情绪激昂。后来成为“中关村第一人”的著名科学家陈春先说，文革初期的“五十天”乃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

◇ 造反派内部的分歧

从造反派组织成立时起，内部就存在不同意见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如何对待保守派上，是否应该和他们一起开会。

1966年10月后，一些造反派，特别是其中善于思考的那部分人，开始从社会角度认识文革。就是说，不能把根源仅仅推到刘少奇这几个领导人的身上，从这些问题的根源来看，总觉得这个社会出了什么毛病，探索如何改革才是我们的出路。

这时候，从高校转抄来的一些文章，如北航的《法西斯党的危险就在眼前》，北师大《大大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大大革新社会制度》等，为很多造反派熟读。地院的学生则提出“一切权力归‘东方红’，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口号，后来又改成“一切权力归左派”。北航一些造反派理论家则说，在新的形势面前，造反派必然分裂。

在这些思潮冲击下，一些造反派嫌“造反团”“右倾”，就在11月初，发起成立了一个新的极左派造反组织“全国红色造反者司令部”（后来简称“全红”），由王锡鹏、陈小虹和科仪厂的史铁柱等签署成立宣言，自动化所的造反派在其中起了一定作用。甫成立，他们就模仿红卫兵，发布了一个《第一号通令》，在里面明确宣布“一切权力归左派”。他们还坚持认为“保守派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这个组织为什么称“全国”呢？因为我院还有很多京外单位，这时也纷纷串联来京，这个组织希望和“造反团”划分活动范围，也为了在名义上不和“造反团”形成分裂局面。

王锡鹏被平反以后，有点像平反后的蒯大富，不是反革命了，可也不被“造反团”待见。可能有这方面原因，他参与了“全红”的组建。但是后来可能由于意见分歧，也可能“造反团”拉了他一把，很快退出“全红”，变成“造反团”领导之一了。

11月25日，在物理所开辩论会，分别请“全红”和“造反团”两方面的人解释他们的立场。“全红”来的是声学所的张家兴，“造反团”来的是王锡鹏和数学所的邹协成。会上辩论了“一切权力归左派”口号。大家知道这个口号来源于十月革命时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但是这样的口号是否适用现在拿不准，造反派也一样。也有部分造反派对这口号竭力攻击。至于保守派是被批判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很多激进的造反派都这样看，但是不说，因为觉得太伤人。总之这些问题的看法确实促使了造反派的分裂。

至于现实问题，有点类似清华大学在8月份的八八、八九派之争。比较激进的造反派认为应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比较保守的则认为应竭尽全力批判张劲夫。

由于这个“全红”太激进，也可能有其他内部问题，许多创始者后来都相继退出，成为一个人数很少、没有影响力的小组织。只在651设计院（即卫星设计院）占优势。后来由于内部争斗，又分裂出另一个“红色总部”，简称“红总”，就更没影响力了。

12月27日，另一群众组织“红旗联络站”（后来简称“红联”）在自动化所成立，有数学所、物理所、声学所、力学所、电子所等十来个单位的造反派组成，靠领导人的号召力，在一些单位里有群众基础。他们自称是“造反团”里的一派，基本上持比较左的立场，但具体观点也不尽一致，未能提出明显区别于“造反团”的鲜明政治主张。有少数单位的保守派因对“造反团”不满，也参与其中。

“红联”一成立，就在1967年1月干了一件露脸的事，从院部抢来一个文件保险柜，放在物理所，目的还是想整李富春、聂荣臻两位副总理的材料。他们觉得不但应地所事件，文革以前我院的一些问题也应与二位有关。

◇ 夺权和内战

1967年1月，全国各处开始夺权。科学院造反派也在讨论如何夺权的问题。夺权本身不是问题，因为在这之前，周恩来已宣布，科学院领导张劲夫等是个“反党集团”。问题是夺权后的组织，是以造反派群众组织出面，还是各所派代表。当时的主流意见，还是各所出代表。

正在讨论之际，1月21日晚上，“红联”和“全红”抢先夺了权，引起了一番内战。

这次夺权，称为一二一事件，不是“红联”领导事先策划的结果，而是在群众讨论会上临时决定的。这一天，“红联”组织群众在物理所的阶梯教室里讨论了一天夺权问题，晚饭后继续讨论。一些激进群众说我们必须现在就去夺权，否则就是右倾了。在他们煽动下，“红联”领导人也同意了。碰巧“全红”领导人邱海平在场，也表示支持和参加。于是群众一哄而起，徒步涌到院部夺了权，也就是几个印章。这事说明，文革中的所谓大民主，至少当时所理解的大民主，是很荒唐的。

这种单方面行动当然引起“造反团”方面强烈反应，立刻对“红联”进行讨伐，而且在1月23日再次进行夺权，成立了临时性权力机构“联合夺权委员会”，简称“联夺”。

23日这一天，“红联”派很多人到院部企图阻止“造反团”的夺权。两派群众发生冲突，也就是肢体碰撞而已。在科学院的文革中从未发生真正意义上的武斗。

1月25日，科学院和国家科委又开大会。周恩来总理讲了话，王锡鹏和张本也发了言。周恩来讲没涉及我院夺权的具体问题，只强调要联合，强调大方向一致，反对分裂主义、山头主义，要互相尊重。但是2月4日传达了他的简短指示：科学院已夺了权，要进一步大联合，原科学院印章作废，新给“联合夺权委员会”刻章，马上组织以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的班子抓生产。

总理的指示肯定了“造反团”的夺权，也给“红联”一个台阶下。根据他的指示，“红联”占优势的各所也派遣了代表参加了夺权委员会。

但是“造反团”继续攻击“红联”。当时社会上各部门和单位也因为夺权问题爆发内战。他们借用清华团派攻击四派的说法，说“红联”是“托派”。2月14日，他们发了一个通令，叫“红联”把1月初从院部抢来的保险柜送回，继而在下午组织大批人员围攻物理所。也发生了肢体冲突，而非武斗。科学院的人也就是这个水平，谁都下不去手。5月8日，“红联”在灯光球场开会予以反击。

从院部抢保险柜这件事肯定是错误的，但是大队人马冲击物理所这样的“机要单位”也是很不妥当的。从这件事后，双方的斗争也就逐渐平息了。当然在联合夺权委员会内仍有暗斗。

“联合夺权委员会”选用原西郊办公室的平房小院（简称西办小院）为办公场所，而没有进驻位于友谊宾馆北馆的院部，以示和旧政权决裂。他们从各所抽调了一些兼职的办公人员。这是科学院领导机构最精简的时期，好在也没有多少事可办。

名义上“联夺”召集的各所代表会是院临时最高权力机构。但是各所造反派派遣的人往往不定，所以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自行前去参加。会场好像十月革命时期的斯莫尔尼宫，也像水泊梁山的聚义厅，七嘴八舌，乱哄哄的。你坐在那里也没人问你是谁，没人管你，因为彼此都不认识。但是如果你在会上发言，就有人打听你是哪个所的。

◇ 成立革委会

这时开始酝酿成立革委会的问题。主要问题是结合哪些领导干部。原来的院党委都被打倒，争论的焦点是结合总理联络员刘西尧问题。“红联”认为刘西尧处理我院两派问题不公，在保险柜等问题上偏袒“造反团”，因而反对结合。刘西尧原来是二机部副部长，由于文革初期在二机部执行“反动路线”的事情还没完，当时没有在科学院结合，但是后来还是被结合了。

刘西尧结合不成，5月14日，院“联夺”写信给陈伯达，要求他出任我院革委会主任，以后又连续三次写信给周恩来要求此任命。但是陈伯达已是我院副院长，越过郭沫若当主任不合适，所以周恩来想找个能压得住阵的来当首席军代表，就选了粟裕。

1967年7月30日，就是1966年两科大会一周年的日期，科学院在人大大会堂召开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聂荣臻、郭沫若、肖华、粟裕、吴德、周景芳、聂元梓、张本等出席。后来周恩来、陈伯达、李富春等也来了。会议由“造反团”周信主持，“红联”邹协成致开幕词，“造反团”王锡鹏作总结。郭沫若当场作诗，周恩来、粟裕、吴德、张本等讲了话。

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由郭沫若任主任委员，常务委员成员有王锡鹏、张魁三、萧剑秋、柳忠阳、李先惠、刘继新、乔林、周信、刘继英、邹协成、戴銮谟。（《中国科学院编年史，中国科学院网站》）其中张魁三、萧剑秋是领导干部。其余皆是群众代表。粟裕虽是首席军代表，但是这次大会以后，他再也没有在科学院露面。由于郭沫若是虚的，结合的领导干部也不很强，实际权力落在“造反团”的造反派手中。主要掌权的是原来院团委的干部柳忠阳。

周恩来在这个会上讲到，夺权后产生不同意见是完全正常的。“你们要承认这个现象，就是说在现在科学院的造反派中大体分来可以说有两派，一个多数一个少数，这肯定是多数少数是个一时的现象，名称刚才我得到，你们原来叫‘三红’现在叫‘六红’，你们就拿这个七月二十九号作为一个日子，正在积极筹建七二九总部。”他说这是“一件可喜的现象”。

他说的“六红”，是哪些“红”，当时也很少有人知道，除去“红联”、“全红”以外，肯定都是些没影响力的小组织。他说的“七二九”也名不见经传，根本没组织起来。他的意思是小组织别太多，反对“小团体主义”，而形成两大派是正常现象，甚至应该鼓励。

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因无“反”可造，大多数造反派基层组织已不经常活动，甚至名存实亡。现在听了周的讲话，又有所恢复，由于人员的重新排队，成立了许多新的战斗组。但是成立以后，基本没有什么活动。大的群众运动时期已基本过去。

这之后，各所也纷纷以选举方式成立革命委员会，结合了领导干部。但是在很多所里，仍然是造反派掌权。

◇ 革委会以后一年

1967年9月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发表后，根据上级布置，科学院开始抓“五一六”。

因为科学院是归周恩来管的，院外群众组织一般不干涉这里的运动。院内的造反派也不跟社会上的组织有固定的联系，当然对其他地区、部门的造反派还是支持的。1967年春，四川“二月镇反”以后，四川大学“八二六”派领袖江海云来院做报告，受到热烈欢迎。两派都派人到四川支援那里的造反派。

至于北京的反周恩来组织“五一六红卫兵团”从未派人来科学院，这里也无人与他们联系，当然不可能抓出什么“五一六”分子来。“造反团”一些人很想乘这个机会整一下“红联”，但无从下手。况且这次运动要求各个群众组织各自抓自己的“五一六”，所以没闹出大的声势来。

但是他们在四不要礼堂开了个会，批判“全红”的领导、651设计院的邱海平。邱海平曾用很委婉的方式称赞伊林涤西给林彪贴的大字报，说他们的观点很难驳倒。（伊林涤西回忆曾在科学院做过报告）所以现在有了批判的借口。

这个抓“五一六”的运动没什么结果，到了1967年底就结束了。到了1968年3月24日发生了杨余傅事件，有批判右倾的征兆，局势有一些动荡。国家科委的造反派头头张本被逮捕，也不知道为什么。于是少数造反派又活跃起来，两派的都有。这次批判的是院党委的“第二套班子”。就是说，在院党委快垮台的时候，院监委一些干部也参加批判院党委，所以现在怀疑他们是院党委预先安排的“第二套班子”。这个活动当然也没什么结果。

从1967年9月起，院新技术局各单位进驻了军代表。他们一般支持造反派，但不涉及造反派内部斗争。他们倡导“斗私批修”，以及一整套“早祝晚颂”的仪式。当然非新技术局各单位也很快学了这一套。在意识形态上，他们力图恢复文革前的概念，认为派性是由“私”字引起的，是知识分子脱离工农、脱离实际造成的，所以基本上恢复了文革前政治学习那一套，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经过文革的“洗礼”，群众对此不很信，只在表面应付。

1967年聂荣臻提出一个大国防科委概念，并开始着手组织18个研究院。根据毛泽东10月25日一个指示，科学院新技术局各所要并入国防科委各院。后来一部分所并入了，一部分所又退回科学院。还有一些单位一分为二，分别并入国防科委和保留在科学院。这使得中关村这块本属科学院的地盘变得四分五裂。

在此期间，科学院新技术局的造反派也曾介入国防科研口的运动，如参加5月4日在北航召开的“彻底批判国防科委某些负责人的山头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分裂主义誓师大会”。这些头衔都是国防科研口造反派乘“三二四”之机给聂荣臻扣的帽子。因为垮台的杨成武是“华北山头”的，涉及聂荣臻，所以他设想的18个研究院计划也没有完全实现。

（未完待续）

□ 原载《昨天》，少数词句略有改动

~~~~~

【追根溯源】

## 关于文革的基础条件

• 李大同 •

讨论文革，不是看它的表现形式（当然形式也很重要，譬如最近网上打倒方方、张文宏的漫画，与文革时打倒走资派的宣传画一模一样，让人惊叹这种“艺术”的遗传力，实际发端于戈培尔和斯大林），而主要是看文革得以产生的基础是否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不是不可逆的。对我个人而言，谈论文革，主要不是看文革中发生过什么，而是要看发生这些的基础是否还在。

多年前，在和朋友们讨论文革话题时，我曾经有过一个总结，即文革究竟有哪些条件支撑才能发生。概括起来来说，大致有如下几个条件：

1）国家有一个超级魅力型领袖，无论精英层还是芸芸众生，都对它顶礼膜拜，没有人敢于对他批评与质疑。这使得这个领袖具有不可抗拒的强大的社会动员力。（希特勒、斯大林与毛泽东在这一点上惊人雷同。）

2）国家掌控新闻、出版、学校教育、广播电视、文化艺术等一切意识形态工具，得以长年对民众进行洗脑教育，造就出大批毫无独立思考意识和能力的脑残民众。（最近网上有个帖子，是一个老清华人的困惑：他出身贫困农家，凭天资和勤奋考上清华大学，而他的幼时同学，几乎没有上完初中的。几十年过后，他被拉入小学同学群，一段时间后，他惊讶地发现，这个小学同学群讨论的话题与观点，与他所在的清华同学群惊人相似，他困惑地发问：文化程度和社会地位相差这么大的两群人，怎么会有这种共性？他百思不得其解。）

3）国家掌控所有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以致你如果不依附体制，你就根本不可能活下去。当年刘少奇、彭德怀挨整后都说过，“大不了回老家当农民，种地去。”这也许是传统社会官吏最后的避难之地了——可惜，在这个体制下，他们连这一点也是梦想罢了，不经最高当局批准，哪个人民公社敢让他们回来当农民？八零年我刚当记者，有一次去巴盟首府采访，在一个饭馆里，一家三口过来向我乞讨，母亲先拿出一张介绍信给我看，上面写着某公社某队某某母子三人因生活困难外出乞讨，特予批准云云，上盖公社大章。我目瞪口呆：难道乞讨也要官方批准？母亲回答说，如没有这张介绍信，他们娘三个根本到不了这里，路上就会被公安抓回去。这个政权对人的生死控制，竟能到这个地步，绝对独步世界。不要说梅兰芳、马连良这样的名角，就连在天桥混口饭吃的侯宝林，不也统统收归国有，拿工资？这就是卡住你的经济来源，任何人必须完全依附体制才能存活。

4）军队、警察及司法机关等国家暴力机器，无条件地效忠领袖个人，在实施党内外镇压时，没有任何法律底线和人权底线，林昭、张志新等旷世惨案，只是这个国家暴力机器中微不足道的部分。文革中湖南道县、北京大兴发生的对贱民“四类分子”斩草除根式的野蛮屠杀，与纳粹对犹太人的灭绝，又有何区别？即便在文革的混乱中，镇压机器也没有一天停摆过，几百联动高干子弟，还不是一夜之间抓捕完毕。

5）国家闭关锁国，严密控制任何外国人进入与外部信息的输入，即便是执政党的高级官员和大学教授，也对世界的真实面貌所知甚少。中共官员阶层和知识界对世界的无知，乃是晚清、北洋、国民政府中最甚的。这种无知，导致整个国家上层执政的粗鄙化。

6) 无论何人, 只要你表现出不顺从、不驯服, 就必定会遭到国家有组织的对个人与对家人的迫害, 由此锻造出从国家元首到平民百姓全部包括在内的全民性恐惧(甚至毛也恐惧, 恐惧大权旁落), 这种恐惧成为毛时代中国人内化的精神特征。或许只有在毛时代走过来的人, 才能体会到罗斯福总统提出的四大自由里, 为什么会有一项“免于恐惧的自由”。

7) 整个中国社会, 没有任何一种有组织的力量能够对执政党、对老大构成制约, 议会、政协、民主党派、工青妇、文联、作协等一切组织或团体, 均为执政党的花瓶、摆设、仆从和帮凶打手。只有在这种不受任何制约的执政条件下, 才会出现饿死几千万人而社会不吭一声的历史奇观。

我大致想到的, 就是上面七个方面。这七个方面就是毛泽东时代的基本特征, 或曰“毛政”的基础条件。正是这些条件的支撑, 在舞台上才能上演文革这种反文明的活剧。四十年来, 这种活剧, 演员走马灯般的变动, 舞台背景在变换, 剧情也不断推陈出新。确实有些剧目, 有些人物的表演, 太似文革, 所以人们说文革又回来了。然而在我看来, 文革是否正离我们远去或归来, 判断的标准不是现在舞台上的来去匆匆的过客, 而是支撑舞台下面的那七根柱子是否仍在? 是否仍在主导着中国的社会生活? 如果是这样, 又怎么可以认为文革不会再来或文革再现了呢? 它从来没有离去而已。

中国向人类普世文明演进和归化的真正障碍, 不是什么文革, 而是“毛政”, 文革是毒树之果, 而毛政是毒树之根脉。可以说, 不彻底清理和埋葬毛政, 则类似文革的丑剧会一再上演, 甚至更为丑恶与极端也未可知。

我们简单捋一下毛政的7根支柱如今是否安在吧。

1) 毛那样的卡里斯玛型领袖基本上不可能再生, 然而这个政权的性质, 却必须围绕着老大运行, 老大必须比同僚享有更高的权威, 老大必须说了算, 否则这个党就一定会分崩离析。邓曾明言“毛在, 毛说了算; 毛不在了, 我说了算。”这是说给陈云的, 意思是党内不能有人平分最高权力。邓还担心继任者江, “什么时候你说了算我就放心了。”这个政权实际上意识明确地在搞个人崇拜, 江是“核心”, 胡得突出“总书记”, 如今则干脆“定于一尊”、“不许妄议”了。这种个人崇拜, 本质是让全党和民众敬畏权力, 特别是最高权力。毛已死了近半个世纪, 然而毛政未除, 民众对最高权力者的仰视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 看看那些今上视察时欢呼雀跃的大学生们就知道了。毛政个人崇拜即权力崇拜这根柱子并未倒塌, 尽管不如毛时代那样光鲜。

2) 意识形态洗脑的机制变了吗? 丝毫未变。我们的孩子, 甚至从幼儿园开始, 就已经被强迫洗脑, 直至大学毕业。这时大部分人的思想, 都已经固化。前面提到的地处京城顶尖大学的清华毕业生群, 竟与边远农村的小学同学群有大致相同的话题与观点, 乃是因为整个中国的教育, 严厉排斥批判与质疑精神, 视独立思考者为异端, 以政府的是非观为是非标准, 来处理经政府高度选择后提供给他们的相同的信息, 如此这般, 大学生与小学生又能有什么本质区别? 私人至今不能拥有新闻出版的权利, 一切艺术作品都要经过官员的审查和批准才能问世, 这与毛政时代有区别吗?

3) 这一点似乎变化很大, 国家似乎不再垄断全部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 市场经济在中国似乎也不可改变了。这里不加论述了, 只需指出, 中国的所谓市场经济, 仍是国家权力的附庸, 国家垄断所有主要经济命脉和资源, “做大做强国有企业”, 而市场经济的市场, 只是国家的余唾, 美国的企业家能造火箭放卫星, 造飞机造航母, 为全世界提供联网、开发人工智能, 是国家创新主要和强大的推动者, 中国的民营企业能干什么? 中国的民营企业,

实际上只能依靠央企国企给他们一碗饭吃，更不要说被银行卡着脖子了。柳传志不久前在接受采访时坦言，“中国民营企业家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安全感。”安邦几万亿的资产，一夜之间就被国家“接管”，成了国有企业，据大律师陈有西严格审核，安邦所有操作均系合法经营，不过他连为安邦辩护的事儿都没干成，潜规则了。

中国的市场经济主要依靠国际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确实做大了财富的蛋糕，不仅没有像左派理论家们曾担心的那样会动摇共产党的统治，相反，由于政府攫取了这块蛋糕的大部分，反倒极大地增强了政府的统治手段，竟然能支出上万亿的财政来对内“维稳”，超过了军费的支出。一个没有宪政制度，没有法治环境的市场经济，会变成一个什么怪物？实际上，成为了用低人权、低福利和国家补贴的方式参与国际竞争，逐步搞垮了国外的同类企业，然后用源源不断的国际市场购买力来为政权输血。这种一本万利的所谓市场经济，是一个专制政权所能梦想得到的最佳馈赠。而另一方面，创造出巨额财富的中国人民，仍然在为孩子上学、医疗、养老发愁，不敢花钱也没有多少钱可花，城市中产阶级用毕生积蓄买一套住房，实际上只是一纸70年的租约，因为土地不是你的，是国家的。在敲骨吸髓榨干人民血汗却不提供任何基本福利保障方面，这种畸形的市场经济，与当初的计划经济并无本质区别，人民的无权状态没有任何改善。

4）暴力机器的使用更加公开化和野蛮化。在毛时代，国家暴力的使用，还多少有一点意识形态的遮掩，譬如用组织处理或群众专政的名目，而如今变为赤裸裸的，在网上说几句话就能被警方拘留和罚款，被警方动辄“喝茶”训诫的知识界人士何止千百，堂堂首善京都，光天化日之下暴力驱赶“低端人口”，砸毁店铺，推倒住房，那些早上去上学的孩子，下午回家已经没了，只好趴在废墟上做作业的图片，不知让多少人潸然泪下。至于各地频频发生的拆迁血案，城管土匪般的街头暴殴良善小贩甚至公开抢劫财物，更是当今中国常态。中国当今的统治以国家暴力为主要依托，再没有比不久前人大会议那一幕更荒诞的了：众多军人正步进入全国人大会议会场，这是在宣示什么？

5）中国似乎不再闭关锁国了，目前在国外大约有几十万中国留学生，每年去境外旅游的中国人，据说也达上亿人次。这确实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开放时代，是巨大的进步。然而在评邓那个讨论里我已经强调过，真正的社会进步，不在于发生了什么变化，而在于这种变化是不是成为了不可逆的。遗憾的是，当初看起来绝无可能控制的互联网，已经被当局利用国外先进技术，基本上改造成为了一张“中国局域网”，对中国普通民众，实际上封锁了一切对统治不利的国外信息，这种封锁实际上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国的科技创新，因为科研人员无法利用Google这样重要的检索工具，无法顺利登陆国外相关网站获取最新信息。对国外人文社科方面重要著作的翻译出版，肯定早已受到严控，别的不说，李锐老的庐山会议实录一书，八十年代随处可以买到，且见过多种版本，何况这还是中国意识形态主管胡乔木力主出版的，如今成为了禁书，绝不许再版。我不久前在网上购书，偶然购得台湾学者关于北洋政府外交研究的专著，阅读后颇为震动，里面有太多我们从来不知道的史实。当我在某群里推荐此书时，一位学者告我已成禁书，不许卖了。众所周知，在八十年代，谈论毛，谈论文革，是一件多么寻常的事，如今还可以吗？已经逆回去了不是吗？废除国家领导人职务终身制也曾被认为是一大社会进步，如今也逆回去了不是吗？因此，如果统治需要，再次闭关锁国是不可能的么？严格说起来，中国政治从来就没有开放过，即便在最为宽松的八十年代，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何曾有一天消停过？在经济方面，尽管有加入WTO时的明文承诺，但15年的缓冲期过去了，人们才发现，中国当初信誓旦旦承诺的众多开放领域，一个也没有兑现！四十年来，中国的所谓开放，小心翼翼地严格控制在有利于统治的边界上，从来就没有对世界真正开放过。完全可以说，现在不过是中国闭关锁国的2·0或3·0版。共产党国家真正的改革开放，或许正在越南上演，这是指经济领域的全部开放与

政治制度开始有步骤地向宪政制度演进，如同越共领导人所宣示的那样：“越南最终将建成一个像美国那样的国家。”

第6与第7两根支柱，基本是原装的，不必多言。

上面的极简陈述，说明了虽然历经了四十多年的时间，但毛政的基础基本没有触动，相反还由于经济的发展和财政的富足得以加固。在这种统治平台上，文革式荒诞再现根本就是题中之义，出现更为丑恶的事也不足为奇，毛在天安门广场使用的棍棒，没有升级到邓的坦克与冲锋枪吗？

中国的真正问题，不是文革，而是毛政。毛政一日不除，中国人民的劫难就不会终止。摇滚歌手崔健曾说过一句极富哲理的话，不管你多大年纪，“只要毛像还挂在天安门上，我们就是同一时代的人！”信哉斯言！

□ 来源：作者博客

~~~~~

【血雨腥风】

重庆文革武斗往事

• 王昊轩 •

在文革初期，许多城市，北京，上海，广州都爆发了武斗。但重庆是闹得最大的。武斗的双方动用了机关枪，高射炮，坦克，甚至是军舰。如果不是造反派不会开飞机的话，甚至可能会动用战斗机。如果说别的地方是武斗的话，那重庆就是一场小规模战争了。

◇ 这是在一个荒谬的年代发生的悲剧

重庆武斗分为两派，一派叫八一五。八一五派，是1966年8月15日成立的。1966年6月，重庆大学的校长书记郑思群被四清工作组给打倒了。郑思群是个好人。他爱护学生，甚至还把学生掉在食堂的饭捡起来吃。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重庆大学的学生饿的水肿。郑思群看了心急如焚。他找到重庆市长任白戈，硬是讨了一批黄豆给学生充饥。对于上不起学的穷学生，郑思群会给他们发奖学金。看到穷学生连买鞋的钱都没有，他给光脚上学的学生送鞋子穿。郑思群在重庆大学不摆架子，平易近人，因此受到很多人的拥护和真心爱戴。但在文革初期，他被扣上了苏联间谍，里通国外的大帽子。仅仅因为他曾给苏联专家送过重庆的风景照片作为礼物。郑思群被控制后，遭到了侮辱，逼供，殴打。不允许别人给他送饭。被逼着光着脚板，走在重庆1966年7月火热的水泥路上。在受到羞辱和诬告后，郑思群动了自杀的念头。他曾经对妻子发牢骚说，彭德怀、黄克诚这样立过战功的人，要批就批，要整就整，自己算得了什么。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于是在1966年8月2日晚上，郑思群要了根香烟，然后用藏在毛选里的半片剃须刀，割断自己的颈动脉自杀了。

郑思群的死，激怒了重庆大学的师生，让他们和四清工作组产生了剧烈的冲突。于是在1966年8月15日，三千名重大师生和重庆师范专科的造反派，联合成立了八一五派。另一派叫反到底。是从八一五派中分裂出来的。反到底的成员，大都很年轻，许多还是重庆的中学生，却参与到了这场荒诞的闹剧之中。那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又是怎么打起来的呢？

60年代初，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市委书记张西挺被李井泉主持的西南局打成反党分子，一直关押。1967年五六月间，刘、张获平反昭雪，复出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副主任。重庆两派围绕“刘张”平反复出的问题产生了分化，“8·15派”反刘张，“反到底派”拥刘张。总而言之，两派之间的斗争，是为了争夺权力。当时重庆市长任白戈已经被打倒了，整座城市群龙无首。

在冲击政府机关夺权后，因为内部权力分配出现分歧，再加之对罗广斌等关键人物的支持出现分歧，1967年2月，黄廉、邓长春等人从“8·15”出走，成立了“反到底”派。“反到底派”，也就是要砸“八一五革联会”的“砸派”，俗称“反吊起”。

◇ 两派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一直到最后武斗全面升级、爆发

一开始，双方用的是拳头和冷兵器。1967年4月23日，两派组织在北碚、重钢等地辩论，但谁也说服不了谁。发展到最后动了拳头、互相砸宣传车和广播器材。5月23日，两派人员在重庆石油学校发生武斗，双方从动拳脚升级到使用钢钎、铁棍、匕首。是月武斗之风蔓延全市：在重庆医院、嘉陵机器厂、西南师范学院均发生了使用这些武器的武力冲突。1967年6月5日至8日，西南师范学院两派发生武斗，全市两派分别派数千人参战，揭开重庆大规模武斗的序幕。

然后武斗的双方就开始用热兵器了。1967年7月8日，两派武斗组织在红岩柴油机厂发生冲突，打死9人，打伤近200人。这次武斗中双方首次使用枪弹。这一仗被称为“打响重庆武斗第一枪”。潘多拉的盒子打开后，重庆武斗全面升级。从小口径步枪，到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手榴弹。甚至还动用了坦克，高射炮，军舰。从巷战到野战，仗打得越来越热闹，死人越来越多。山城重庆，变成了战场，血肉横飞，宛若人间地狱。

1967年7月25日清晨，住在建设机床厂厂区劳动一村的人们，发现对面民主村屹立在山巅上的两幢苏式红砖楼，被突然出现的“反到底派”围攻。早上8点左右，“反到底派”来了很多人。他们手持钢钎、大刀、燃烧瓶，身穿劳保服，头戴藤帽，围着红砖楼进攻，不断地向这两幢红楼投掷燃烧瓶。红砖楼于夜间被“八一五派”占领，这是建设厂“反到底派”不愿意看到的，他们觉得必须夺回来。数百名“反到底派”武斗人员轮番进攻，不断地向红砖楼投掷汽油弹。双方展开攻防拉锯战，伤亡惨重。“反到底派”一直攻到上午10点左右，于深夜将两幢红砖楼居民赶走并占领红砖楼的空压厂。

“反到底派”的武斗人员跟“八一五派”的人一样，大都是中学生和工人，建设厂以青年工人为主的“反到底派”组织——“红大刀”，驰名中外，其成员大都是身强力壮、狂热冲动的棒小伙，在钢管焊上本厂生产的三棱刺刀，人手一柄，长约丈许。他们找来梯子往红楼上攀登。驻守大本营的“八一五派”看见建设厂方向昨夜拿下的堡垒冒起了滚滚浓烟，开始派出增援队伍。“八一五派”的“八一兵团”是工人组织，空压厂是制造两栖坦克的工厂，这些造坦克的工人从空压厂自己命名的所谓“八一大楼”内冲出来，手提砍刀、钢钎，一路喊着杀声，狂叫着朝建设厂家属区的民主村红砖楼冲将而来。

这时，建设厂围观的人群中有一个叫王林仲的建设厂工人，有人对冲过来的“八一兵团”的武斗人员悄悄说，这个人是“反到底”的。说时迟那时快，三个人冲过来用钢钎捅王林仲的腰杆，王用手去遮挡，手当即被刺穿，血流遍地。这些人又赶着去解救红砖楼的战友去了。在“八一兵团”的猛攻下，“反到底派”迅速撤退，兵败如山倒。

上午11时左右，一个“八一五派”的武斗人员看见一个“反到底派”的红卫兵退在后面，就提着钢钎从红砖楼边冲过来。这时在山下围观的建设厂职工家属都发出惊骇声，那里有一个长年堆积如山的垃圾山，大约有一幢楼那么高。“反到底派”的那个红卫兵硬是扔了钢钎从垃圾山跳将下去，追赶的人如同投掷标枪一样，奋力将手中的钢钎朝那个“反到底”掷去！

中午12点左右，重庆三十五中高中一个叫宋正言的红卫兵撤到其中一幢红砖楼的背后，恰好被包抄过来的空压厂“八一兵团”截住。住在建设厂劳动村的数千人都在山崖下看见，此时两个身穿藏青色工作服的“八一兵团”武斗人员，用钢钎狠刺已经倒地的红卫兵。两条钢钎刺进去再扯出来，扯出来再刺进去。事后发现，宋正言倒地的地方是一个鸡笼，人血溅到鸡笼的木栅上，厚厚一层。战斗结束，双方撤离，这算是一次战役，以“反到底派”的暂时失败告终。

身受重伤的宋正言被“反到底派”的人用凉椅抬下来，他身上护体的一层薄钢板被刺穿，藏青色工服被鲜血浸透。宋正言一共被刺透25刀，于当日午后1点左右死去。宋正言的死让占领建设厂地区的“反到底派”愤怒了，他们回到大本营，立即在重庆两杨公路上拉起了一条钢索，这条钢索上全是钢钉。交通中断了，一场大战即将拉开序幕。

1967年7月29日，传来重庆工业校发生了枪击事件。武斗立即开始升级，很快发展到动枪动炮，机枪、坦克、军舰不在话下。建设厂是军工企业，主要以生产枪炮为主。枪战发生后极大地刺激了“反到底派”的“井冈山建设兵团”，立即发枪！没多久，重庆各地的“反到底派”前来筑巢，人人摩拳擦掌，发誓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武斗双方都以“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激愤地要消灭对方，恨不得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7月30日，“红大刀”在建设厂灯光球场举行了隆重的发枪仪式，“反到底派”发誓一定要为宋正言烈士报仇！数百支崭新的半自动步枪举向空中，拉开了枪机，一箱箱的子弹用刺刀撬开，分发下去。8月1日清晨，全副武装的“反到底派”向建设厂“八一兵团”和建设工业学校修筑的工事发起进攻，建设厂生产的四联装高射机枪和舰用机枪数十台，一齐向“八一五派”的大楼开火，并用炸药炸开楼房工事。“八一五派”占据的红色大楼顿时火光冲天，喊杀声不绝于耳。附近“八一五派”的重庆机械制造学校的“机校兵团”也参与了防守。双方战斗极为惨烈，枪炮声整夜不停，震耳欲聋。史称重庆的“八月战争”。

8月3日清晨，“八一五派”全线溃退，带走尸体十数具，在“反到底派”的追击下，被打死的腐烂在水田里的还不在其中，其中的一部分后来就埋在沙坪公园的“八一五”公墓里。8月5日，“八一五派”为了争夺建设厂夺取武器，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向建设厂清水池制高点发起攻击。“反到底派”人抬肩扛，将两台14·5毫米的4条枪管的重武器推到半山腰上，猛烈轰击大批围攻上来的“八一五派”。“八一五派”进攻的大都是重庆大学组织来的学生，他们手持各种火药枪、“汉阳造”，朝清水池高地冲锋，均被“反到底派”各种轻重武器打死，死伤者漫山遍野。重庆8月的天气，尸体很快高度腐烂，白骨森森，惨不忍睹。经此一役，“八一五派”丧生150人之多，这些人大部分却没有被安葬在公墓里，有的死者至今无人知晓姓名。

1967年7月31日至8月6日，重庆荣昌县两派共700人左右参加武斗，死亡78人。

◇ 不但陆地上发生了战斗，武斗双方还在长江上打了个不亦乐乎

8月8日，望江机器厂的反到底派用3艘炮船组成舰队，沿长江炮击东风造船厂、红港大楼、长江电工厂及沿江船只，打死24人，伤129人，打沉船只3艘，重创12艘。这一次水战，八一五派遭到重创。八一五的船长江207想要突袭反到底的望江101，结果反被后者打得着火了。一些船员想要跳江逃生。结果反到底的望江101停船，用机枪扫射落水者。见一个打一个，想要赶尽杀绝。等到战后有人登上了长江207，发现船上的人都死完了，船员有的被打的脑浆迸裂，有的连肠子都流出来了。这就是文革中震惊全国的重庆八八“海战”。

同日，空压厂八一五派武斗队将坦克开出厂区，经沙坪坝到市中心解放碑示威，进城公路沥青路面上被压出的坦克履带印痕很久未消……。8月13日，两派在重庆解放碑展开激战，交电大楼及邻近建筑被焚毁；8月18日，沙坪坝区潘家坪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死亡近百人；重庆三十五中初三学生于某，即在1967年7月25日被“八一兵团”追杀的那个“反到底派”武斗人员，在其后不久的8月19日，进攻潘家坪五台山重庆雾都宾馆的夜晚，即被乱刀捅死。于某身高1.75米左右，手提一支冲锋枪，腰插一支手枪，一个人身上背着一个班12个人的干粮，于当日一个人独自摸索上五台山，因口令不对被“八一五派”活捉，最后被用刀捅死后，尸体扔下山崖。紧跟着，“反到底派”连夜用数台14.5毫米4条枪管的高射机枪轮番攻击，他们占领宾馆后发现于某血已硬凝，抬下山来，为其举行了安葬仪式，给他穿上抢来的军装，手握两颗子弹，十数人鸣枪为于某送行。

“反到底派”占领五台山雾都宾馆后的一个中午，一个“八一五派”“机校兵团”的人身穿工作服，携56式冲锋枪一个人闯了进来，看见“反到底派”的人员正在吃饭，刚要转身，被其校友发现。只听见一阵乱枪扫射，此人当即倒在血泊中，胸如蜂窝，血喷涌而出。

◇ 武斗死难者中除了于某这样的战斗人员，也有无辜的平民。比如重庆市民席庆生的母亲

重庆沙坪坝一带是八一五派的势力范围。这里现存113座武斗死者的墓碑，掩埋了404人的尸体，死难者中最小的年仅十四岁，最大的六十岁，其中就包括席庆生的母亲。席庆生的母亲黄培英能埋葬在这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席庆生的父亲属于八一五派，她是八一五的家属。席庆生的父亲本来是汽车司机。他在工作单位参加了八一五派，还成了八一五派在新华书店的一个小头目，肩负着保卫仓库中存放的大量“红宝书”和毛主席画像的重任。而当时只有十五岁的席庆生，则参加了反到底派。成了父亲的敌人，只有母亲居间中立，哪一派也不参加，既要在乱世中照顾丈夫，也要保护孩子。

重庆武斗开始后，席庆生想和同学们一起参加战斗，去战场上做战斗英雄。但父亲却极力反对未成年的儿子参加武斗，认为这不是小孩子应该参与的。母亲黄培英则跑到学校，把席庆生拉回了父亲坚守的仓库。日夜看守着儿子，不允许他离开自己一步。一次席庆生趁母亲煮粥的时候，想偷偷溜出去参战。但还没跑出去，就被母亲发现。为了拦住儿子，情急之下，母亲打翻了滚烫的菜粥，脚也被烫伤了。但黄培英还是忍住揪心的疼痛，一瘸一拐地追上去，死死抓住了席庆生的皮带。她流着眼泪瘫坐在地上，终于阻挠了儿子去参加武斗。在母亲不幸去世后，席庆生每次回忆到这一幕，都不禁泪流满面。

如前文所述，1967年7月中下旬，重庆武斗开始。“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在杨家坪地区爆发大规模激战，席庆生家所在的滩子口成了双方厮杀的前沿阵地。数百人的队伍在这里正面交锋。两边的高音喇叭都放着毛泽东的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还有林彪的语录歌“枪一响，上战场，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完蛋就完蛋，完蛋就完蛋”，人们喊着口号冲向对方的阵地。一刹那枪炮齐鸣，血肉横飞……

1967年8月23日，重庆大学“八一五”和空压厂的“八一兵团”等“八一五”派武装，开始进攻电校“东方红”据守的王家大山。“反到底”派的望江厂（军工）101舰队赶来炮火增援，其他“反到底”派队伍也向王家大山集结。一场惨烈的战斗打响了。“八一五”派虽然跟着坦克进攻，但是仍然被“反到底”击败。重庆大学“八一五”的“301突击队”十几个参战大学生被打死，装甲运输车也被“反到底”缴获，双方各有几十人战死，杀红了眼的两派准备着一场更大的战斗。

在这天晚上，席庆生的父亲随“八一五”派撤离了杨家坪地区，他托人带信给妻子黄培英，叫妻子赶快离开单位，带身边的两个小孩到大渡口亲戚家去避难。8月24日席庆生和弟弟跟着母亲匆匆离家，一起加入了逃难的人群。离开家的时候，时年三十八岁的黄培英带走了户口本和全家最宝贵的财产，两只老母鸡。为了躲避战火，她还给两个孩子和自己换上白色衬衣，以此表明自己手无寸铁的平民身份。希望交战的双方能高抬贵手，不向他们开枪。当母子三人快要走到目的地重庆钢铁厂的时候。悲剧发生了。一颗子弹嗖地一下掠过了席庆生的头顶，15岁的少年敏锐地卧倒在地。就在他还没有反应过来时，第二记枪声凄厉地响起，就在同一时间，母亲“啊”地一声惨叫，席庆生扭头一看，母亲左手捂住左胸，仰天倒下……席庆生一下子从地上跃起来，他扑到母亲身上，拉开母亲的手，这才看清楚子弹是从左边乳房部位射入，横穿整个胸腔，再从右胸穿出，鲜血喷泉般从弹孔处汩汩涌出来，不停地翻冒着血红的泡沫。席庆生紧紧抱住母亲，不停地叫“妈妈！妈妈”，摇动着她血肉模糊的身体，试图唤醒已经毫无知觉的母亲。突然，奇迹出现了。母亲竟然苏醒过来，她奋力挣扎，终于仰起了头，睁大眼睛寻找着，仿佛寻找她另一个孩子。这时的黄培英已无力说话，只是无声地向眼前心爱的长子送来最后一瞥。席庆生从这一瞥中读出了绝望、祈求、愤怒，甚至还有点歉疚她就要离开了，可五个孩子还太小啊……然后，母亲的眼睛一翻，就永远地闭上了。母亲的最后目光，定格成一张永不褪色的底片，从此经常浮现在他的眼前……

之后，重钢厂山头阵地上的12·7毫米高射机枪开始疯狂地扫射。席庆生跳起来，脱掉穿在身上的白汗衫，朝对面山头挥舞，一边大声地喊：别打了！别打了！我们是老百姓，逃难的……回答他的是一阵更密集的枪声。他又被迫扑倒地上。子弹密集地从耳边突突噗噗地射过，飞溅起来的沙土纷纷落在他头上身上。枪声停歇下来以后，席庆生又跑过去，他爬到母亲身边，用撕下来的衣服去堵伤口。他条件反射般地做着徒劳的救护，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母亲再流血了！然而，血仍在不停地往外冒，将田坎四周的青草地染红。少年绝望地抬起头望着太阳，他记得，那时的太阳是黑色的，正午的天空和大地也都是黑色的……席庆生扑在黄培英身上，跟母亲一起躺在地上，脑海里一片空白。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也许只有一会儿，席庆生听到远处传来人声，仔细听，是从田坎边上的民房里传出来的：“娃儿，快过来，快过来，这边来躲。”民房里躲着的农民目睹了这悲惨的一幕。心中不忍，想让席庆生避难。这喊声将席庆生拉回到现实中，也让他有了逃生的意识。他慢慢爬去，在一块辣椒地里找到了躲着的弟弟。弟弟被枪声吓得全身发抖，面色苍白，一看就是恐惧到了极点。席庆生拖着年幼的弟弟，一前一后慢慢爬了二十几米，终于爬到农民的房门外。他们刚站起来，机枪哒哒哒地又打过来。两兄弟扑进门，躲在门口石柱后面。

一个多小时后，枪声才停下来。席庆生拉着弟弟，匍匐穿过两派交战的中间地带，徒步走到了重钢厂，去寻找他们的父亲。在一个三岔路口，他突然看见了父亲正带着手下几个转业军人在理发店里。即将参加武斗的人，全部要剃成光头。看到父亲，席庆生才痛哭起来。他告诉了父亲刚才所发生的一切。咬牙切齿地说：“妈妈被你们‘八一五’打死了！”然而，那些和父亲站在一起的光头，眼睛里没有一丝一毫的诧异和震惊，只是木然地看着哭诉的少年。席庆生说，在一刹那间，他只觉得被钢钎钻心一般，原本完整的世界轰然坍塌，而仇恨也在这一刻萌生了。在交战双方的火力控制下，白天无法抢运尸体，席庆生只能远远望着暴尸荒野的母亲。在烈日曝晒下的山脊上，母亲的白衣衫在绿野中是那么醒目耀眼……席

庆生知道，从此他没有妈妈了。那个死死攥住他的皮带不让他外出参加武斗的妈妈，再也不会对他大声嚷嚷：“庆生，你给我回来！”

席庆生一直守到第二天凌晨，才和父亲及其“战友们”一起，趁着天光朦胧，偷偷将母亲的尸体抬了下来。在炎炎夏日里曝晒十几个小时，已经使黄培英的尸体肿胀变形。这时父亲的“战友”们押来四个反到底派的“俘虏”，命令他们将尸体用福尔马林清洗，然后用白绸裹上，装进棺材，用车运到位于沙坪坝公园内的一块墓地，草草掩埋。席庆生的母亲黄培英从此长眠在这里。但这还没完，之后的一幕更令席庆生震撼，让他一夜之间长大。

俘虏中一对“反到底”父子，被“八一五”抓住，五花大绑，眼睛蒙着黑布，带到了一块空地上。造反派扯下父子眼睛上的黑布，让他们自己挖坑。挖着挖着，父亲突然意识到这个坑就是埋他们爷俩的。他放下铲子，求饶说：“你们杀我吧，我儿子还小，求求你们放过他！”他的儿子和席庆生年龄相当，最多大一两岁，还不知道自己和父亲面临死亡，只以为是被惩罚劳动，还使劲卖力地挖着。那位父亲的话还没说完，一声枪响，他哼都没哼一声，就一头栽进尚未挖好的小坑里，两只脚直直向上戳着。接着，又一颗子弹飞过来，儿子也应声倒在自己挖的坑里。杀人者拿起父子俩的铲子，铲了几铲土，遮掩了尸体，扬长而去……

席庆生就在离现场不远的地方，目睹了这一幕。事后他回忆说，当时他浑身颤抖，胃部痉挛起来。慈母的惨死和这次冷血的屠杀，击碎了他对那场“大革命”的浪漫幻想和英雄主义迷梦。后来，席庆生知道了杀害母亲的是和父亲同属一派的一个“战友”苏某。刚刚发了枪，他想试试自己的准头，就随便找了个目标射击起来，而这活靶子正好是穿白衣的母子三人。苏某当时并没有因为枪击平民受到“八一五”派的惩处，因为他是“自己人”和“战友”啊。

之后席庆生在1969年武斗结束后被派去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经过几年的磨难后，回到重庆当上了一名卡车司机，娶妻生子。文革结束后，杀害席庆生母亲黄培英的苏某只被判了三年有期徒刑，不久就释放了。席庆生对此很不满，觉得判决不公，想要自己复仇。1978年5月，席庆生终于找到了凶手的线索，在得知苏某正在一所医院里住院，他毫不犹豫地着手复仇。他准备了两套方案：一是到医院去绑架苏某，然后用汽车拉到武隆的大山里去，让汽车和人都坠入悬崖；二是用汽车把他拖在车后，到市中心解放碑去拖死示众，同时向人们宣布他的罪状。

为此，席庆生先后三次化妆潜入医院，认准了苏某所住的病房，经过观察确定了绑架的最佳时间是中午11点45分，那是医生护士都去打饭的时间；他还准备了一辆吉普，以及绳子和匕首，找来一套警服。为了不连累妻子，他还在行动前和恩爱甚笃的妻子办了离婚手续。到了行动的那一天，席庆生抑制住内心的激动和兴奋，和弟弟开车驶进重庆钢铁公司医院，准时于11点半到达病房楼三楼，穿过空荡荡的走廊，推开了苏某所住的病房门，然后他呆立在那里。病房内没有医生，没有护士，更没有他寻找了整整11年的杀母仇人，病床是空的！那一刹那，席庆生紧紧攥住的拳头已经捏出了汗，他的心发出阵阵的抽搐，几乎窒息。他脑海中预演了无数次的复仇画面，此刻化为泡影。万般沮丧的席庆生只能选择离开。

那次精心准备的复仇行动，为什么会失败，席庆生一直找不到答案。他怀疑是父亲报告了公安局，通知凶手躲开了。因为行动前一天，他曾回父亲家，跪在地上向父亲告别，说：“杀母之仇，不共戴天。明天我要去搞死那个姓苏的！”他怀疑父亲用某种方法制止了他的行动，但父亲至今仍对此保持沉默。而那个苏某就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从此再也没有了下落。讲完这个故事，席庆生向记者表示，如果现在自己遇到杀母仇人，不会杀人，但一定会扇他几个耳光。

1967年，8月28日，歇马场发生3000多人的大武斗，双方死40人，杨家坪街道被毁近半，武斗双方死亡100人。”

◇ 武斗的双方十分残酷，甚至互相枪毙对方的俘虏。

在八月战争中，市政服务没有了，渝中半岛变成了垃圾堆；粮食、蔬菜的供应都断了。连郊区的农民也遭了殃。文革”前，区蔬菜公司与生产队签订了合同，每年要队里生产各类时令瓜果蔬菜1万斤，分别送到邻近的河运校、党校、515厂等企事业单位，保证这些单位食堂的蔬菜供应。在武斗刚开始的时候，反到底和八一五派在公路上用钢钎大刀往来厮杀，重庆郊区的菜农给单位送菜时只得赶紧避让，有时一避让就要耽误几个小时。好不容易把菜担到单位食堂，这些单位却停课、停产，单位里的人为躲避武斗也跑光了，找不到人过秤开票。菜农怕把菜蔬倒在食堂以后单位不认账，只好又将菜担回来喂猪。

之后武斗双方动用了热兵器，枪炮不长眼睛，子弹到处乱飞。一天，重庆的农民在田里挥动镰刀收割庄稼。突然一串子弹落在田地里，溅起朵朵水花。吓的社员们齐刷刷扑倒在水田里躲避子弹。炮弹落下，树木被拦腰打断，高压线也掉在了地上，电灯也不亮了。为了保护农民的安全，生产队不再安排集体出工，连菜也不给单位送了。但农民还是要买火柴油烟之类的生活必需品。只能趁反到底和八一五两派武斗间歇的时候去买。购买者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健步如飞。但还是不免被两派误伤。一个大热天里，社员张树清上街去买东西，在回来的路上被不知哪一派的冷枪击中了头部，倒在田坎边，被人发现的时候身体都已经僵硬了。

“很多人都是被裹挟进来，然后稀里糊涂就牺牲掉的。”周家瑜说，他认识的一个低年级同学，因为喜欢把子弹壳做成钥匙链，挂在屁股后面叮叮当当的响，为了捡弹壳，被打死了。还有人是在送饭的时候被打死的，重庆育才中学女生梁自巧，在给守清水池的八一五派送饭时，在建设厂三八宿舍附近罹难。

1967年9月5日，经毛泽东主席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了《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即所谓九五命令下达后，重庆的武斗中止了一段时间。八一五和反到底被下令缴枪，但双方都没有执行。之后战端再开。

1968年双方再次爆发大规模武斗，这一次“八一五派”吸取了去年的教训，先步步为营，占领“反到底派”的据点，然后在“反到底派”的边缘地带修筑工事，迫使其后退，到武斗打起来时，“反到底派”已无还手之力。1968年6月29日开始，反到底和八一五激战三天三夜。当时重庆武斗已经打了一年多，双方都死伤惨重，不免产生了厌战情绪。但还是打了起来。到这个时候，反到底已经露出了颓势。在一次战斗中，七十名战斗员被当场打死四人。还有被俘虏的七人也被八一五给枪毙了。只有一个建设厂的子弟，自己参加了反到底，父亲参加了八一五，被八一五派俘虏后因父亲说情而幸免遇难。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大多数俘虏被俘后无人说情，就被枪毙了。

除了枪毙俘虏，还要枪毙叛徒。重庆文革墓园里有两座无字碑，其中一座无字的原因是这样的。一对建设厂的夫妻，丈夫是“八一五”的高级干部，妻子是总部话务员，后因怀疑妻子是“反到底”间谍，两人分别被八一五派的同志秘密处死。入葬时因为“间谍”一说并无实质证据，又不能按“烈士”的名分立碑，碑文就空了下来。最终成了无字碑。

这次冲突后十天，1968年7月9日，两派在江陵厂重燃战火，双方动用坦克、大炮、轻重机枪激战，附近民宅被炮击得千疮百孔。也是当月上旬，两派还分别在杨家坪、大坪、重庆医学院、二四二部队、五一技术学校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均出动水陆两栖坦克、舰艇、三七炮、四联高射机枪、野战炮等重武器。两路口至杨家坪无轨电车网被打烂，全线停运1年多。

1968年7月30日，在生产半自动步枪的一个特大型军工企业里，发生了文革中重庆一次激烈的武斗。其场地主要集中在4幢职工宿舍，有两幢被“八一五派”占领，“反到底派”据守在另两幢单人宿舍里，其中一幢被称为“三八宿舍”。双方都在黑夜到来时，从窗台上伸出半自动步枪朝对方开冷枪。重庆建设厂中“八一五派”的一个红卫兵当即被击中脑袋，脑浆迸裂。此人就埋葬在“八一五”公墓。姓刘，年约17岁，后被“八一五派”追认为“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英勇战士”。事实上，在那个时候谁也保卫不了谁。小刘的父亲，一个从湖北汉阳到重庆的老工人操着浓重的汉阳腔说：“个巴马，有球用！”刘老汉活至1999年6月，无疾而终，享年95岁。

战斗进行到次日凌晨，“反到底派”的火力完全被“八一五派”压制，陆续从几幢楼房撤出，这些人携带大量轻重武器撤退。枪炮声一直持续至天亮。此战过后，八一五彻底控制了局势。因为之前反到底也枪毙了八一五的俘虏，为了害怕对方会大规模报复。反到底成员及其家属数十万人分批逃离重庆。成渝铁路沿线大批的“反到底派”成员携家带口前往重庆火车南站集中。在这里，一个“反到底派”红卫兵手提一支20响盒子炮在现场指挥，火车头上架起了两挺重机枪。火车行驶到重庆大渡口火车站，被部队拦下，双方发生小规模流血冲突。“反到底派”在此四散而去，大部分人都拦下火车去了成都搬救兵，想借兵打回重庆。

因为当时成都被四川大学的八二六造反派控制，他们和重庆的反到底派交好。就给了点支持。于是从重庆逃到成都的两千名红卫兵，拦截火车到四川绵阳，广元，找当地驻军要武器弹药，准备杀回重庆。幸好驻军严词拒绝，避免了更多的生命财产遭殃。

◇ 尾声

1968年9月23日，重庆市革委、警备区发布命令，严令一切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无条件上缴一切武器弹药、运输车辆；拆除武斗工事、据点；解散专业武斗队。1968年10月15日，两派宣布撤销总部，解散组织。重庆武斗就此结束。

两个月后，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重庆武斗的幸存者，包括席庆生本人，大部分都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而八一五和反到底的头目，多被判了刑。有的人，一辈子都因此做噩梦。在1967年7月25日的战斗中被“八一五派”武斗人员刺伤的王师傅，至今还躺在床上，他的思维还停留在刀光剑影的派性厮杀中。有朋友去看他，拉着他被钢钎刺穿伤残了的手，王师傅会情不自禁地问道：“‘反到底’打回来了么？”如果回答说早打回来了，年近八旬的王师傅马上会露出会心的笑容，脸上的愁云一扫而光，大喊一声：“拿酒来，我们要好好地庆祝一下！”他还能从1967年坚持到现在，也就是40多年后21世纪的今天，全凭的就是“反到底”打回来的信念。王师傅的神志是清醒的，妻子问他：“你知道你的退休工资涨了好多？”王师傅先伸出一个指头，然后再伸出3个指头：“137块7！”而在1967年7月25日争夺建设厂红砖楼的厮杀中，用钢钎刺死重庆三十五中学生宋正言的一名“八一五派”空压厂“八一兵团”武斗成员，因长时间被血腥的梦境所困扰，很多年一直内疚不已，于2002年3月18日患肝硬化而亡。

对于重庆文革时发生的荒唐而血腥的武斗，许多参与者并不觉得自己做错了。毕竟他们也是响应中央的号召起来闹革命的。主观上并不是想做坏事。而是为一个崇高的目的献身。正如红卫兵墓园上许多红卫兵刻得那首诗歌一样：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愿那个荒唐的年代永远不要回来了。

□ 来源：微信号《阳光梦》

~~~~~

【史海钩沉】

考教授：“文革”荒诞事

• 刘振修 •

1973年，国务院决定恢复高校招生，并在考试中实施文化水平考查。然而一个地方的普通考生在考试中交了一张白卷，这位考生就是后来以“白卷英雄”闻名的张铁生。

在正常时期，这种极端行为只会作为笑谈，但在特殊的年代，在一些人手里，却可以成为一件犀利的武器。在那个“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年代，既然学生要考试，考考教授又有什么不行？“极左”派以辽宁为试点，选择沈阳医学院，以开会为名，把基础部38名教授、讲师召到第四教室，拿出事先策划好的考题，突然袭击考教授。由于长期没有接触数理化公式，一些教授没有答上来。这股“考教授”之风从辽宁刮起，很快就蔓延到北京、上海。

1973年12月30日，国务院科教组、北京市科教组召开会议，决定对教授“突然袭击”，进行考试。上午开完会就组织人员在清华出题，下午就带着考卷到17所院校去考教授。他们以开教授座谈会为名，把650余名教授骗到考场进行“突然袭击”。发下考题后，强迫这些多年来从事文史哲、外语、体育、艺术、医学等专业研究的教授们当场答卷。试题不顾教授专长，分政治、语文、数学、理化四部分，考试结果及格65人，占10%；不及格585人，占90%，有的更交了白卷。

1974年1月3日，上海市革委会文教组召开各大学负责人会议，决定对大学正、副教授进行一次考试，考题以1973年高校招生测试中若干中等水平的试题为主要内容。1月5日上午，市革委会文教组对全市18所高校的教授进行考试。其中复旦大学将正副教授集中到一个大教室，主持人宣布立即进行考试，试卷是本校各科的入学试卷，包括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政治考试的内容有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毛泽东讲话原文及其发表时间、地点，列宁论帝国主义的特点，“鞍钢宪法”，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语文有《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天问》《资治通鉴》《论衡》《聊斋志异》等的作者及写作时代等。

因“术业有专攻”，很多教授没有答上来。如谭其骧是中国历史地理学权威，数理化考题除了一亩等于几方丈一类题目外，大多数题目没有“考”好。考试下来，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只能举其大意，帝国主义的五大特点只写了三点，“鞍钢宪法”没有答，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没有写全，数理化只做了面积这一题。当天下午，市革委会第一办公室来人找谭其骧与王福山（物理系前主任、教授）、朱伯康（经济系教授）座谈参加“考试”的感想和体会。

这次考试是“极左”派“教育革命”的杰作，考试的结果被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毫无知识、一窍不通、连大学生入学资格都没有的事例而广泛宣传。复旦大学考试的结果更在上海广泛传达，如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写不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某教授本专业的试卷考了不及格以及某些“反动学术权威”全部交了白卷等等。

交白卷的教授中，北师大历史学家白寿彝是一个突出例子，据白寿彝的女儿回忆：父亲被骗进“考场”，当场识破了“四人帮”那些人的诡计，当拿到卷子以后便在上边只写了三个字：白寿彝，便拂袖而去。除白寿彝之外，在北京“突袭考试”中，不合格的590人中，共有200个是交白卷的，很大一部分人都是拒绝作答。这次考试，任何教授不管学问多大，职位多高都得考试。值得注意的是，复旦大学教授谭其骧在此以前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但也没有能享受免试的“豁免权”！

1979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苦恼人的笑》，再现了“考教授”这一中国教育史上荒诞的一幕——1975年冬，一位记者奉市委宋书记之命到医学院去采访“教授考试”，当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受考官们愚弄，错把肛门表放入口中，引起考官们笑骂时，记者震惊了。但让记者更加震惊的是，宋书记遇车祸重伤时，却指名让老教授给他做手术，且手术成功后仍坚持批判老教授。电影对当年黑白颠倒的现实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 来源：《文史博览》2014年第4期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华夏文摘》网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专用地址： <a href="mailto:tougao@cnd.org">tougao@cnd.org</a> 其它事项请电邮： <a href="mailto:cnd-cm@cnd.org">cnd-cm@cnd.org</a> |             |          |

---